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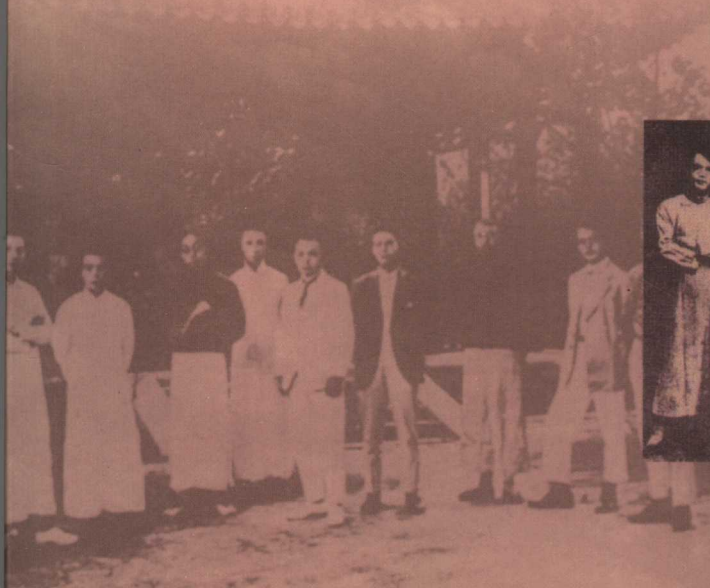
SHAONIAN ZHONGGUO XUEHUI

YANJIU

少年中国学会

吴小龙 著

研究



上海三联书店

少年中国学会研究

吴小龙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少年中国学会研究/吴小龙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5. 10

ISBN 7-5426-2198-X

I. 少... II. 吴... III. 少年中国学会(1919)—研究 IV. K26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8250 号

少年中国学会研究

著 者 / 吴小龙

责任编辑 / 王笑红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责任制作 / 林信忠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印刷四厂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50 千字

印 张 / 18

ISBN 7-5426-2198-X/C·116

定价:28.00 元

《少年中国学会研究》序

耿云志

五四时期的少年中国学会是当时很有名、影响很大的社会团体。它吸纳了当时大多数知识精英和青年领袖。这些人后来在各个不同的领域中,各个不同的党派里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个团体本身却经历不长的时间就陷入内部矛盾之中,并终于四散了。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过去因存在种种忌讳,一直很少有人对此做深入系统的研究。已有的研究中,且颇有一些不忠于事实的偏见。吴小龙同志的博士论文《少年中国学会研究》,是迄今所见有关这一问题的最全面、最系统、最深入的研究著作之一,值得相关的研究者参考、借鉴。

提起少年中国学会,不禁令人想起上个世纪初,梁任公先生的一篇名文《少年中国说》。当时梁先生遭戊戌政变之难,流亡日本,创办《清议报》,议论时政。他面对清政腐败,内忧外患日亟,因受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马志尼创立“少年意大利”,集结爱国青年,英勇奋斗,终于完成统一建国,复兴意大利的事迹的感发而著此文。梁先生说,当时日本人都说中国是“老大帝国”,意思是,中国已老朽无生气,可任人宰割。梁氏不服气。他认为,国之为老大,或为少年,全决定于国人自己之精神。“我国民而自谓其国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国民而自知其国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西谚有之曰,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然则国之老少又无定形,而实随国民之心力以为消长也。”梁氏又指出:“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

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他怀着无尽的希望呼喊：“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

五四时期的青年，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多少受过梁任公先生的影响。我未曾阅读少年中国学会的全部文献，不知道他们是否提到过梁先生。但我知道他们中有人确曾说到，他们也同样受到马志尼的“少年意大利”的感发，要改造老大之中国为少年之中国。

但是，创立少年中国学会的人们自始就未曾对少年中国作出任何明确的界说。学会初创时期的灵魂人物王光祈，在阐述学会旨趣时只是说，“吾人所欲创造之‘少年中国’，即适于二十世纪之少年中国也”。二十世纪学说之杂，主义之多，举不胜举。所以加入学会的人，就有遵信各种主义的人。王光祈也承认，“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各有各的主义，而且是各人对于自己所信仰的主义非常坚决，非常彻底”。在阐述学会的宗旨时，所列举的四条：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仍嫌笼统。少年中国学会有各地的分会，又有所谓各科的科会。可见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学会，而是兼容各种学会的综合性的团体。这样的大团体实相当于国家科学院或类似皇家学会的机构。这岂是靠志愿结合而能够长期维持的团体？

有一点值得注意，王光祈特别强调，少年中国学会坚持要大家做好将来从事各种主义的训练。

自晚清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为了挽救国家民族，为了实现独立、民主、富强的理想，就一直存在着急进与缓进，革命与改革的争论。戊戌时期，有人说，中国贫弱、愚昧与落后，需要首先从教育入手，作育人才，再图改革制度。而另一些人则认为，那样缓不济急，应当利用皇帝的权威，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必须大变、全变。结果失败了。后来又有人说，中国所积累下来的腐败、落后，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提高民智，厚积民力，亦非依靠暴力革命所能打造成功。故须做扎实的和平改革，以求逐步达到目的。但另一些人则认为，满洲异族，非我同类，不可能实行改革；必须推翻其政权，始能建立民主制度，以进图富强。结果，虽然清政府被推翻了，皇帝被赶跑了，民主制度却没有建立起来，更不用说进图富强了。到了五四时期，少年中国学会的一部分领袖分子又想从容地训练自己，为救国、强

国准备好条件。可是,客观条件仍是不容许他们这样做。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起初也都是不打算直接投入政治,都预备做一段较长时期的努力,为改造国家,建设国家打下思想文化方面的基础。不仅胡适这样想,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们起初也是这样想的。然而,形势比人强。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学生运动一发而不可止。接着,更有工、农奋起;加之国内外矛盾交织,政治问题一个接一个地逼人而来,就连打定主意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也不得不谈起政治来。在如此形势下,少年中国学会的年轻人们,怎么能够躲开那逼人的政治呢?

在那时代的中国谈政治,真是花样翻新,无奇不有。从最激进的无政府主义到最保守的复辟君主制,样样都有。这是因为,一方面,自封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崩塌以后,中国社会远远没有来得及整合。另一方面,在政治文化上,西方发达国家要比中国先行了二三百年来。西方这二三百年来曾经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思想、学说、方案,都伴着滚滚西潮一齐涌进到中国来。有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就造成了中国政治思潮的纷繁复杂。

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绝大多数都是思想未定的青年。他们各以其出身、教育、社会关系等背景的不同,而分别受到不同政治思潮的较大影响,从而形成不同的政治思想倾向。因内忧外患的煎逼,救国心切的青年们,各以自己之所信为唯一真理,不容许他们认为错误的思想掺杂其间。于是,激烈的分歧与斗争遂不可免,到了一定程度,分裂散伙就势所必至了。

过去,因现实政治的原因,而把少年中国学会分裂的责任一定要推到某一部分人的头上,如同有人一定要把《新青年》团体分裂的责任推到某个人的头上一样。这都离开实事求是的精神,离开历史唯物主义太远了。

深入研究少年中国学会,不但可丰富和加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认识,而且在某些方面还可以加深对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加深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认识。我希望吴小龙的这本书的出版,能够引发学界同行的兴趣,把这项研究更进一步推向前进。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少年中国学会的筹备和成立	(5)
第一节 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	(7)
第二节 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和筹备	(14)
第三节 少年中国学会及其分会的成立	(24)
第二章 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活动	(39)
第一节 早期的理想认同和共同追求	(41)
第二节 使学会活动具体化的努力	(54)
第三节 社会活动的尝试——工读互助运动	(63)
第四节 少年中国学会的出版事业	(79)
第三章 少年中国学会内的思想争论	(93)
第一节 “主义”问题的提出	(95)
第二节 南京年会和“主义”争论的激化	(109)
第三节 《少年中国》月刊上对主义问题的讨论	(119)
第四章 围绕“国家主义”进行的激烈斗争	(135)
第一节 “国家主义”派的兴起及其理论	(137)
第二节 “国家主义”的各项政策方针	(155)

第三节 “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分歧和斗争	(169)
第四节 “国家主义”的理论失误	(193)
第五章 “少中”后期历届年会及学会的分裂	(201)
结语	(221)
后记	(229)
附录:	(231)
“少年中国”的追求和失落——简评少年中国学会	(233)
理性追求与非理性心态——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非基督教运动 平议	(250)
卢作孚的思想遗产	(269)
跋	(278)

前 言

少年中国学会是(以下简称“少中”)五四时期出现的最重要的社团之一。在当时出现的诸多青年社团中,它会员最多、分布最广、历史最长、影响最大,聚集了青年学子和其他社团中的许多精英分子。在它存在的七年中,它在全国青年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和感召力;在它作为一个社团分化和消亡后,它的成员又在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学术、教育、文化各领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以至于 20 世纪 40 年代就有人说,当今中国,已是“少年中国”的天下。但对这样一个重要团体,长期以来对它的重视和研究却很不够。为数不多的文章中无不肯定它是五四时期影响最大的社团,但却基本上把它定性为左中右三派知识分子(即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而后则由于政治立场和主义信仰的对立而分裂。这个概括看来并不错,但对少年中国学会更为丰富复杂的内容和意义却未能作深入的探讨。实际上,“少年中国学会”的意蕴远不止于此。在它那短暂的历史中,它曾试图聚集起国内各学会社团的精英分子,它试图寻找一条改造中国的独特道路,它也试图形成一种学社体制,它更试图形成一种学术传统——独立于政治,但保持对政治、社会事务的关注、批判性思考和道义参与,在这些方面,少年中国学会虽然都未能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但其努力的过程却留下了感人至深、发人深省的历史篇章。

五四前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种种探索 and 分化在“少中”的历史中得到了集中的反映。这个从朦胧的理想追求到投身政治斗争的过程发展得相当迅速。尤其是中共早期的不少领袖出自这个群体,他们从少年中国学

会群体的宽泛的社会改造理想出发,很快发展到明确的革命道路的择定,而这个选择决定了中国现代史面貌。这个转折在当时思想界学术界的总体氛围下是怎样完成的,还有待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入阐述。后来站在反共立场的国家主义派和青年党的核心成员也出自这个群体,他们后来作为政治上的失败者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他们长期坚持既反苏反共,也反国民党独裁专制的政治立场以及作为这种政治态度的根据的“国家主义”理论,今天也是值得做一番客观的分析和评判的。而最重要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内部不断进行着关于走政治革命道路还是社会改造道路(通过发展教育和实业这两种“社会的活动”)的争论,它既构成了这一群体的活力又构成其危机,而这,正是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界在探索中国的出路上不同思想观点、价值取向的分歧和争论的集中体现。这种分歧和争论几乎贯穿“少中”的整个历史进程,它有着深刻的含义,尤其值得今天反思和借鉴。学会内后来更为激进的共产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两个主义之争可以说已经由历史做了结论了。但它仍值得我们今天从学理上对其进行深究,而发生在这两种主义之争以前,几乎与学会相始终的,更为宽泛意义上的论争——政治革命还是文化改造,确定一种“主义”还是容许思想自由——则具有更深沉悠远的文化含义。少年中国学会的绝大多数会员,隐然认同并持守到底的实际上是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原则——这一原则何以不能在学会、群体中得到确立,何以在不断的论争中终于失落,何以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被完全否定,这里包含着更为曲折的历史意味,这更是今天研究少年中国学会这段历史所必须探究的。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在五四前后登上历史舞台的一代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满怀忧国之情和改造社会的热望,真诚地探索中国的出路所经历的心路历程。这一代人的思想和理论思考的发展过程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页重要篇章,通过深入研究,我们能从中发现的意义、获得的启示是很多的。

本书试图从上述这些方面,尽可能全面地对少年中国学会作一个分析和阐述。包括“少中”从筹备到成立的历程及其多方面的活动,“少中”会员们的理想追求和他们对社会改造问题的种种思考,以及这种思考和探索过程中必然面对的最尖锐的问题:走什么道路、用什么方法来改造中

国——“主义”之争就是由此而引发的。“少中”活动过程中的内容相当丰富：它的会员中很多人后来成为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如沈怡、恽震、舒新城、吴俊升等，为中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做出过贡献；它的会员中还有一些人后来成为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如方东美、宗白华、朱自清、田汉等，这些人的学术思考和文艺创作在“少中”时期也已开始起步；“少中”会员还发起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影响很大的反宗教运动和其后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会友中甚至还产生了杰出的实业家；“少中”所发行的丛书和刊物及其所开展的一些重要讨论，也构成了二十年代前期中国思想文化运动的一个有价值的组成部分。这些方面的丰富内容在本书中尚未能全部一一进行分析和论述，有的只好留待日后再作进一步研究。本书的探究侧重，主要放在对“少中”的发展和分化影响最大的两个问题上：一是在学会历史上持续始终的关于“主义”问题的争论，二是导致学会后期的思想斗争加剧并使学会最后分裂的围绕国家主义的激烈论争。尤其是后一点，鉴于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国家主义的思想理论进行全面论析的研究还很少，故本书对此作为重点，予以稍加详细的论述，并提出自己的一些初步观点，作为今后对这一问题继续深入研究的开端。

第一章

少年中国学会的筹备和成立

第一节 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

少年中国学会产生和存在的这一段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相当特殊的一段时期。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在内忧外患不断的困局中挣扎,艰难地寻找着一条民族复兴的道路。被“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震撼的国人,在此后的一百年中,所走出的每一步路几乎都是在内乱外辱的巨大压力下被迫迈出的,其间容不得半点的从容和自由。从洋务运动中急切地仿学“坚船利炮”,到戊戌更急切地变法维新,乃至清末的“新政”,每一次或大或小的变革,莫不出之于危局中的急切。然而这些自强图存之举不但未获成功,得到的只是一次比一次更令人扼腕叹息的惨痛失败,终于使国人意识到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腐朽的清廷身上,反满革命成了大势所趋,并在辛亥一举推翻了千年帝制,建立了民国。然而民国既成,局面却并未如人们希望的那样顿然改观。帝制传统崩解后的社会失序,反而使国家陷入更大的混乱与黑暗中。军阀混战、政治腐败、民生凋敝、道德沦丧——这个新建的共和国曾经有过的一点点新气象几乎是倏忽即逝。这迫使国人——从政治家、革命家到思想界、文化界——都在思考: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出路又在哪里。

一次次政治改革乃至革命的失败和落空自然使人们想到:更重要的问题恐怕在于思想、文化,只有整个民族的思想意识、文化素质得到改造,适应于新的时代要求,政治革命、社会改造才能成功。于是,就在一群最没有文化的军阀武夫统治中国的时期,就在民族灾难深重、看来最不可能有文化创造的雅兴的年代里,一场新文化运动兴起了,并迅速席卷了全国。从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创刊到1924

年国共合作掀起大革命高潮,在这十年间,新文化运动所掀起的思想潮流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并开始改变中国历史的方向;不过短短的十年,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们绝对料想不到,他们所发动的本意在政治之外的、试图以持久、渐进的文化工作来改造国民的思想、提高国民的素质的“文化运动”,居然以一场雷霆万里的大革命风暴和其后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结束,而中国在 20 世纪的命运,几乎已经在这不到十年里就被决定了。

少年中国学会不但是这个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而且也是这期间整个社会思潮的集中体现,而这个时期的社会思潮及其内在矛盾和斗争,决定了少年中国学会此后的路向和命运,又通过“少中”群体中那一大群佼佼者,极大地影响了其后中国的历史进程。因此,在论述少年中国学会前,有必要对新文化运动及这期间的社会思潮先做一个概述。这个概述不打算对新文化运动作全面的一般性叙述,只想就其对“少中”的成立及其后的思想动向有重大影响的内容作重点的提示。

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是《新青年》杂志。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为代表的新青年群体在新文化运动中掌握着思想、言论上的领导权、起着主导作用,或者用时下的说法,他们掌握着“话语霸权”。尽管当守旧势力还很强大,在与《新青年》群体的一系列争执、论战中,他们的观点在思想、学术的意义上也有相当的分量——尤其是今天看来,人们更容易体认其中的道理,但是在当时,对于社会思潮起着更大影响的显然不是这些倾向保守的言论,而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这些五四主流知识分子的言说。他们的话语不但深得青年学生的认同,而且很快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和心态,并且自觉不自觉地成为青年学子和全社会的主要思想资源。其中,最突出的,对少年中国学会成员们的思想认同影响最大的,当属以下三个方面:一、对一种理想社会的真诚而急切的信念;二、对科学、理性的无上崇拜;三、对现实政治的否定、拒绝和回避。

陈独秀在《〈新青年〉宣言》中这样说:“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辗转不安的,懒惰而烦闷

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1〕}这种急切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似乎是当时社会思潮的一大特色。它看来不隶属于任何思想体系:既不是传统的桃花源、三代之治、大同小康,也不是西方的乌托邦、理想国、太阳城,也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它具备当时国人所希望的、所能想得到的一切美好特征。而且,现实越是黑暗,人们对现状越是失望,就越相信这没有缺陷、弊端和阴暗面的社会理想真的很快能实现。这是一个特殊时代中的国人所陷入的一种奇特的心态。这种心态既使人们憎恶现实,又使人们相信未来;既唤起了希望,又唤起了真诚,更唤起了急切,但是,它却是很空泛而不现实的。如果全社会都以尽快实现这种十全十美的理想社会为希望,产生的恐怕只会是一种很不正常的急切偏激心态。不幸,新文化运动确实唤起了相当一部分人对这样一种浪漫理想的真诚而急切的追求。

其次,就是对科学、理性的崇拜。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声称,《新青年》对旧社会犯下的“滔天大罪”只有两条,就是“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2〕}其实,这德、赛二先生虽然始终并称对举,但当时人们更多地理解和接受的却是“赛先生”——科学。因为民主在当时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显然是无法实践的;只有科学,怎么说都不犯忌,哪个阶层都相信它对于自己的利益是有益无害的,于是出现了胡适所说的那种奇怪现象:“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3〕}陈独秀说,“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科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4〕}“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行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

〔1〕《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4页。

〔2〕《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页。

〔3〕《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集,第302页。

〔4〕《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5页。